

参 考 信 息

江苏理工学院图书馆主办 第 3 期 (总 172 期) 2015 年 3 月 25 日

大学精神与校史建设

编者按：大学精神的主要内涵可概括为独立、自由、求是、责任。大学精神的本质是向学生和社会传递、弘扬并揭示人道、地道、天道。大学校史的研究是体现“大学精神”相对独立的研究领域，它不仅是从“长时段”探讨中国近现代大学发展规律性的课题，而且也是认识当代中国教育变革尤其是大学变革、发展的重大课题。如何通过对近代化进程中的大学变迁的历史过程及其历史特征的揭示，来探明制约中国大学精神形成的社会因素，概括出大学走向“一流”所应坚持的大学之道，这是大学校史研究的最原始意义。大学精神何谓？透过大学校史，我们发现近代中国大学精神至今还未过时，在争创世界一流，争创名牌大学的今天，重温近代中国大学精神就显得尤为必要。为此，我们选编部分材料，供领导和相关部门参考。

目 录

1. 大众化时代大学精神的失落与重建..... (2)
2. 校史建设与大学精神凝炼..... (5)
3. 大学校史与现代大学精神..... (8)

大众化时代大学精神的失落与重建

（一）大学文化的精神意蕴

1. 成就人格的育人精神

育人是大学最根本的使命，培育完整人格的是大学的根本目标。何谓具有完整人格的人，英国著名神学家、教育家约翰·纽曼（John Henry Newman）曾经有过明确的表达：“我们在他身上可以看到高度的正直、体谅与包容；他处处替他的对手们设身处地的着想，替他们辨正错误，他对于人类理性的弱点与优点、范围与限度都知道得很清楚。如果他是不信奉宗教的，他高深的见解和开阔的心胸必使他不至于讥刺宗教，或有反宗教的行为；他一定很聪明，所以他虽然无信，却不至流于武断或盲动。”

2. 追求真理的治学精神

蔡元培在《就任北京大学校长之演说》中，曾经精辟地指出：“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者也。”这一追求真理、发展知识的精神传统，来自“开启了普鲁士和德国，甚至于可以说整个欧洲高等教育的新时代”的柏林大学。其创立者洪堡认为大学的作用不能仅限于传授知识、保存和传递已有的传统文化，大学教师的首要任务是自由地从事“创造性的学问”，学生则应至少在“日益增大的知识金庙上置放一块砖石”，大学应该成为学术研究中心。这是柏林大学在不到半个世纪里，迅速成为世界一流的大学的根本原因。同时，以追求真理为己任的大学人有为真理而献身的勇气和信仰，使之超越世俗功利的诱惑，在承认理性的权威之前，不承认有任何权威。

3. 启智醒世的批判精神

大学是知识分子的聚集地，他们在追求真理的过程中必然伴随着对一切荒谬现象的批判。萨义德认为“知识分子应该质疑爱国的民族主义，集体的思考，以及阶级、种族的和性别的特权意识。知识分子没有任何神祇的崇拜，规定什么可以说，什么不可说。”可以说，批判是知识分子的生存方式，是否具有批判精神是区分知识分子与非知识分子的关键。福柯认为：“知识分子的工作不是要改变他人的政治意愿，而是通过对自己专业领域的分析，一直不停地对设定为不言自明的公理提出疑问，动摇人们的心理习惯、他们的行为方式和思维方式，拆解熟悉的和被认可的事物，重新审查规则和制度。”大学汇集了大批知识分子，通过对社会进行深刻而广泛的批判，使大学具有公共良心和独立品格，为知识发展提供价值导向，同时也引导社会的发展，增进人类的福祉。

（二）大学精神的失落

1. 商业主义盛行

大学是育人的场所，是追求学问的场所。大学虽然基于社会，但总是对社会现实进行有距离的批判，因而对世俗文化起着引领作用。而如今，在商业主义全球化浪潮中，许多大学已难以保持其“象牙塔”气质，自觉不自觉地加入了产业化的行列。为了“做大做强”，追求规模效应，许多大学引进商业运作模式，升格、并校、建新校区、建大学城；为招生更改专业名称、开设热门专业、扩大招生规模……而师资、设施、教学和管理却跟不上扩张的步伐，大楼、大面积、大数字的背后是教学质量的低迷。在生存压力下，教授做学问“为稻粱谋”，为追逐利益许多大学人放弃了最起码的学术道德操守。

追名逐利不仅危害学术自身，也使大学的育人精神失落。浮躁、虚假的学术空气对学生人格产生了十分恶劣的影响。许多大学生并不严肃认真地对待大学这一重要的人生发展阶段，抄袭作业、考试作弊不认为可耻，混学分、混文凭也不觉得虚度年华。学生不关心学问只关心学分，不关心导师是否认真治学，只关心是否通过考试，这种心态也正中无心治学的教授下怀，而那种严谨治学的教师被视为“假正经”而不受欢迎，师生之间达成了一种心照不宣的“默契”。

在商业主义语境中，学生被视为教育流水线下的“产品”，毕业率、就业率、考研率被当做学校教育质量的重要指标。很多学校为了让学生顺利毕业，一方面降低或变相降低考试的学术标准，另一方面方便学生找工作、考研，将四年课程提前三年完成。课程挤占了学生自主探究和广泛阅读的时间，大学学习被简化为上课和考试。在许多大学生眼中，学外语、计算机和其他实用技能的功用要远远超过阅读经典，“考证”、“考研”成为大学生生活的缩影。所谓“读书”，读的最多的是教材或考试辅导书，图书馆成为备考的大自习室。

在商业主义的语境中，大学教师的角色也很暧昧，兼职、开公司、办辅导班……美其名曰为社会服务，实质上已异化为商人。许多大学的研究生称自己导师为“老板”，师生关系异化为雇佣关系。

2. 行政主义至上

大众化时代的大学已不再是少数知识精英和精神贵族自治的共同体，而是国民教育体系的一个环节。在国民教育体系中，教育权力和教育权利分配的政治原则高于学术自治原则，政治因素的入侵使大学越来越难以避免日益扩张的国家权力的染指。不仅“政治正确”给学术自由和社会批判设置了“禁区”，而且在大众化民粹主义“教育公平”诉求下，从办学方向、培养目标到专业设置、招生，再到课程设置、学业管理乃至课堂教学，大学的自主性都受到挑战，大学逐渐沦为国家权力部门的附庸。以此相适应，大学内部为教学科研服务的行政机构也上升为大学的主导。

以行政来主导教学和科研，教学和学术研究优劣的标准掌握在行政部门而不是教师手里，这种外行指导内行的机制，使得教学和学术研究自身的特性和规律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给大学教学的质量和学术研究的质量带来严重的影响。更严重的是，行政权力的扩张进一步助长了官本位思想，极大地腐蚀着大学的精神，使大学有蜕变为官场的危险。有学者尖锐地指出：“今天的大学什么都关心——谈经费、谈人事、谈机构，就是不谈教育本身。”安心做学问的大学教授似乎越来越少，有些教授将学术研究当作谋取官职的手段；有些学者将学术资本与权力资本交换，获取个人利益……毋庸置疑，行政主义已构成当下高校学术腐败的重要原因。行政至上不仅遮蔽大学人的求真意识，而且导致学术自由空间的萎缩和学者独立人格的匮乏，极大地弱化大学人的批判精神。传统知识分子心怀天下，“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社会关怀意识，已经变得越来越陌生。

3. 技术主义泛滥

科学技术在近现代以来所取得的巨大成功，确立了技术理性主义在各个领域的“意识形态”统治地位。在大学里，技术主义也无孔不入，教学、科研、管理都打着“科学化”烙印，否则难以获得合法的地位。

大学教学本应该是师生之间围绕共同关心的学术问题切磋交流的过程，具有很强的情境性、生成性和个性，但在大众化时代，大规模班级教学实质上已使大学教学蜕变成高等知识灌输的过程。为了保证“有效教学”，需要一套“科学的”、“规范的”、“具可操作性的”教学程序和技术。于是大学里建立起从备课、上课、布置作业到考试的技术规范，任何即兴的、随意的、模糊的、或个性的教学活动都因其无法证明其有效性而受到质疑。技术主义也因为其“铁面无私”、“价值中立”、“可操作性”而省去大学管理者面临的人际矛盾调解的麻烦，因而备受管理者的欢迎。如职称评定问题是关系到每位大学教师切身利益的问题，因此成为大学教师矛盾的焦点。由于不同教师所从事的学科和研究领域不同，管理者不可能具有跨学科、跨领域洞察教师学术水平的能力，在这种情况下，需要一种统一的、科学的、公正的评价标准，量化技术正好体现这一“科学精神”。“让数字说话，数字面前人人平等”，任何质性的评价都引起是否公正的怀疑。于是技术主义的量化管理大行其道，也成为行政主义外行管理内行的制胜法宝。

然而量化管理却有着不可忽视的弊端，因为很多带有很大主观性的因素无法予以量化。

对教学来说，不同学科、不同课程的课堂各有不同，不同教师的授课风格也本应该多种多样，个性化的教学能使学生得到不同的濡染，有利于学生健全人格的养成。而学术研究是一项需要投入极大心智的创造性活动，与一般的产品制造并不相同。不同类型、不同学科的科研项目在付出的劳动量和质方面都有不同，很难用相同的标准来予以度量。在量化管理之下，一切管理和评价都变得简单易行，不需要投入太多的心智即可应对。然而它对教学和学术研究的损害却是相当大的，使教学失去个性化的色彩，也使学术研究对量的追求超过对质量的关注。在竞争压力下，大学人变得越来越浮躁，“十年磨一剑”真做学问的人会因其成果数量远远不够而难以在学术界立足，热爱真理，追求真知的大学精神变得黯淡。

大学对技术主义的依赖还体现在各种“表格管理”上，课题申报、重点学科申报、课题结题、出版资助、课程申请、本科生实习、本科生论文指导、个人信息调查等等，事无巨细，都要填表，表格数量极其繁多，使教师把大量时间用在填表当中。学术的真正进步，学生人格的真正成长在这个过程中反而被遮蔽。

（三）大学精神的重建

1. 重新勘定大学发展的理念

面对商业主义对大学的冲击，需要大学人自身保持清醒的意识，每个大学人都应该深入地思考“大学何为”的问题。近年来颇为流行的“教育产业化”，就需要大学人能够以自身关于大学功能、性质、任务的理性认识，对其进行思考，在此基础上，保持理智的清醒。有了明晰的大学理念，大学的运作才能步入正轨，大学的发展才有保证。

无论在任何时代，大学都应以育人为本，这意味着大学在传授知识与技艺的同时，要唤醒学生内在的精神力量，把他们培养成具有深厚的人文底蕴，具有科学思维方式和审美意识以及适宜行为方式的现代人。大学也是追求真理的场所，大学为真理而生，大学精神是一种崇尚真理的文化。这意味着大学必须敢于突破一切既定观念和教条的束缚，敢于向一切权威挑战，始终有独立人格的坚守，崇尚独立思考、独立判断。这种对真理的无条件追求，也是大学批判精神的体现。大学人对社会的关注不仅应该指向社会公正，而且需要对诸如战争、疾病、环境、气候、全球化等关乎人类共同命运的社会问题发出自己的声音，以专业的思考澄清人们对问题的认识误区，增进智识，起到对一种思想启蒙的作用。

2. 重树对大学精神的信仰

对大学精神的信仰，是大学发展的强大的内驱力。只有大学精神成为大学人的信仰，大学才能成为研究高深知识的机构，成为思想批判的中心，成为守护真理的场所，成为健全人格的锻造之地。大学人只有树立对大学精神的信仰，才能在各种挫折面前矢志不渝。

抗战时期的西南联大为我们树立很好的榜样。在战火与硝烟中当中，在一次又一次的迁徙之中，在经历重重磨难之时，西南联大依然恪守大学的精神传统，遵循大学的规则，其中所体现的卓越大学精神，成为中国的大学历史上最绚烂的篇章，也为整个中华民族文明的历史上抒写浓墨重彩的一笔。

在当下商业主义全球化的社会中，重树对大学精神的信仰，大学人才能抵挡各种外在的诱惑，以一份超功利的关怀，不怕吃苦、甘于寂寞、执著、冷静、拒绝媚俗和媚雅、远离浮躁与浮夸，以人格去培育人格，保持深厚的使命感和社会关怀，去除功利主义对学术研究过程的遮蔽，使学术研究的过程成为研究者的心路历程。

3. 以制度创新实现大学的自治

大学自治是实现大学精神最根本的保障。所谓大学自治，就是大学排除外来干预，遵循自己的治理方式，独立处理内部事务。大学自治是处理大学与政府和社会之间的关系应遵循的重要准则，具有深厚的历史传统和经验基础。早在中世纪的时候，大学就通过行会或修道院的形式远离社会政治，确立了理性、辩论的学术传统和社团自治、学术自由的精神。发展到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大学自治得到法律的确认。1957年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大法官费利克

斯·弗兰克福特和约翰·M·哈兰在他们的协同意见中阐述了大学自治的主张，为学自治提供了法律依据：“在一个大学中，知识就是它自身的目的，而不是达到目的的手段。如果它变成教会、国家或任何局部利益之工具，大学将不再会对它自己的本质保持忠诚。”后来，各国纷纷用法律的形式确定这一规则。我国最系统阐释大学自治的是蔡元培先生。他考察国外大学后认为，只有在国家“不管”的情况下，大学才能发挥更大的作用和价值。1922年，蔡元培发表了著名的《教育独立议》，以倡导教育特别是大学要“保有独立的资格，毫不受各派党政或各派教会的影响”。

只有大学自治，才能保障学术自由。美国大学教授联合会在《1915宣言》中对学术自由立下三个原则：(1)教授作为学者和知识传授者有言论自由；(2)除非不胜职守和道德败坏，教授职位必须得到保证生计应有的长期或终身雇佣合同的保障；(3)教授受处分前有申诉的权利。学术自由是大学精神赖以生存的基础，是社会长远利益的需要，也是大学直接面向社会服务并求得自身生存与发展的需要。

大学自治必须依赖制度变革来实现，首先是高校外部制度环境的建构，其中亟待解决的问题是“政府与大学”的关系问题。明确政府该管什么，高校真正能自主的又是什么。其次是高校内部制度环境的建构，核心是解决高校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的关系问题。目标在于实现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的分离。行政权力的主体是校长及行政管理机构，学术权力的主体是教授群体，其组织形式为由教授组成的各级学术委员会，学术委员会对学校有关学术的重大问题应当拥有决策权和审议权。以制度变革为依托来实现大学自治，关键在立法保障。很多发达国家的学术自治，均通过法律的形式得以落实，或要求大学向司法部门提供《大学章程》、《大学宪章》作为大学自治的基本规范，或者通过相关立法予以确认。这些都值得我们借鉴。

4. 讲述大学的故事，恢复大学精神的集体记忆

记忆是一种宝贵的精神资源，有无健全的记忆是衡量一个民族精神素质的标尺。记忆虽然总是指向于过去，但功用却在于当下和未来。因此，记忆既是历史，也是生命。一所大学的发展，同样离不开对其历史的记忆。大学精神就承载于大学校史之中。校史作为一群人共同的记忆，对于培育大学精神非常重要。校史往往积淀着某种历经岁月冲刷仍能保持活力的文化质素，蕴涵着自己的办学价值取向和目标定位，也承载着一代代大学人对大学精神的守望，彰显着学人和人师的风采。因此，进行校史教育是培育和弘扬大学精神的基础和前提。校史教育的方式可以有多种，如建立校史馆，

编订校史，拟定校徽校训，编印校史宣讲资料。通过这些方式，使校史深入人心，让大学人，无论是教师，还是学生，还是行政教辅后勤人员，都能在校史教育中了解、领悟、践履和弘扬大学精神。

（摘自：《大众化时代大学精神的失落与重建》高教探索 2013 年第 6 期）

校史建设与大学精神凝炼

（一）校史的形式及特点

1. “正史”——校史、大事记

修史既是对自身发展历程的记载、反思，也是我国自古以来即有的优良传统。大至国家，小至一县一乡，乃至一个机构，在经过一定的历史发展后，都有修史（志）记录、反思的传统。教育事业尤其是高校，作为一个文化机构，更注重对自身历史发展的反思。自清朝末年出现近代意义的大学以来，我国现代高等教育已有百余年历史。即使从1949年建国后，新中国高等教育重新起步以来，我国大部分高校也有60年左右的历史。因此，现今中国的大学基本都有由学校官方编订的校史，记录学校的成立、发展过程，以及其中的重要历史事件、历史人物。这种“正史”一般分为两种，即校史和学校发展大事记。这两种“正史”均由学校

组织专业人员进行编写。其中校史一般以学校发展的时段为线索，将学校历史划分为若干阶段，将每一阶段归纳总结出不同特点，以反映学校在不同历史时期的不同发展主题。各个发展阶段以重要历史事件、重要历史人物、取得的主要成就及出现的重大波折为主要内容。校史的主要特点是以时间为序、以时段为线、以事件人物为主。随着学校历史的不断发展，校史的编订也需要不断修正，因为在更长的历史时空视角中，学校发展的阶段可能会有不同的划分标准。学校发展大事记则完全是以时间为线索，将学校发展过程中每一年甚至每一月出现的重要事件进行如实记录，而不对事件进行总结和评论，其形式类似我们所说的“流水账”。其特点是详实、权威。一般大事记由掌握学校重要文件材料的档案管理部门、文秘部门联合修订。

2. 口述校史

口述史“最基本的含意，是相对于文字资料而言，就是收集当事人或知情人的口头资料。它的基本方法就是调查访问，采用口述手记的方式收集资料，经与文字档案核实，整理成为文字稿”。作为一种记录和研究历史的形式，口述史同样适用于校史记录与传承。每有新生入学，学长、老师们总会向他们讲述本专业、本校的“传奇性”故事，学校及本专业历史上的名人、前辈……这些口口相传、绘声绘色讲述的故事是最能够吸引新生的，因为刚刚成为这所学校一员的新生，不仅要在身份上有“一纸证明”（学生证），更需要在心理上认同这所学校，融入这所学校。实际上，作为这所学校的一部分，他们在对校史进行了解的过程，也就是一个对自己新身份的认识过程，是一个“自我认知”的过程。这是每一个人基本的精神需要。当他们成为学长、老师后，他们也会将其所知道的“故事”讲述给下一批新生——这是在对这所学校有了精神上的归属感后，形成的一种历史自觉。而一所学校客观的历史，也会因此与现在、未来真正连接在一起，进而使学校因包含着这些对其有精神上认同感和归属感的师生而成为一个有生命的个体。也唯有如此，学校才可能健康快速发展。

这种口口相传的“校史”虽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口述史，但如果进行口录整理，则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在真实性上，因有讲述人的情感加入而有所“折扣”，但一般不会偏离太远，更不会无中生有。同时，也正是因为有情感的加入，才使得这种校史形式生动形象鲜活、吸引师生。口述史还能对学校“正史”的缺漏给予弥补。正史因其官方性，往往过多关注于“高层”事件和人物，而同样能深刻表现学校精神的基层人物、事件却为其所忽视。而口述史则相反，对此有更多的关注。

3. 其他形式的校史——回忆文章、学校往事集、学校名人集、学校图片集等

每逢学校整数周年建校纪念日，学校往往会组织师生编写回忆发生在身边的、反映学校风貌的及师生精神状态的文章，以及编制反映学校发展变化的图册；另外，每有校内知名学者高龄整数周年诞辰纪念日、知名学者逝世等，也会有师生撰写回忆文章；从文化历史发掘的角度，学校还会组织师生撰写学校历史上知名学者、管理者等的名人集；有些学校还会将历史上所有关于本校的影像资料集合整理，制作学校发展的纪录片……这些无疑都具有“历史”的功能，可以归为校史之内容。这些形式多样的校史，既可弥补“正史”和口述史的不足和缺漏，又可满足人们对历史了解的多种形式需要，同时还可与前两种校史互证，加深对校史的研究。

（二）“校史建设”及其意义

1. 校史建设的内涵

校史建设包含两方面的内容：一为校史的挖掘与整理，是为编史之过程；一为校史教育，是为校史之传播与承续之过程。二者都是“校史建设”这一动态过程不可或缺的组成。

校史的挖掘与整理是校史建设的基本工作。一般来说，学校的“正史”大都是以学校建校整数周年为契机，组织人员临时成立校史编撰小组进行校史和大事记的编撰。“正史”的资料一般都来源于学校发展过程中形成的档案资料，具有一定的权威性。这种校史的挖掘与

整理也是当前中国高校的主流编史形式。而学校口述史的建设现在刚刚起步，还没有在各高校广泛开展。据笔者所了解，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为迎2008年建校50周年，曾于2006年设立“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口述历史研究”校级重点项目，对30余位相关人员进行访谈，录制约80小时的影像资料和录音，整理访谈文稿20余篇，并整理剪辑出12位受访人的视频专题片，制作成6张DVD光盘进行校内发行。东北师范大学党委宣传部出版《文蕴东师·往事》一书。该书通过东北师范大学的离退休老同志、在校师生及优秀校友讲述当年在校学习、工作和生活的点滴故事汇集而成。书中有很大一部分文章是由校报的学生记者对当事人进行采访录音，根据录音资料整理而成的。此项工作虽然并非有意进行口述史资料采集，但在客观上却采用了口述史的方法。回忆文章、学校名人集、图片集等形式的“校史”大多时候并非是出于“修史”的目的有意为之，而多是出于纪念先人、展示成就等目的，但是读者们却能从这些资料中看到真实的学校历史。

校史教育是校史建设的“高级阶段”，其目的是让所有学校新成员（包括学生和教师）了解所在学校的以往历史。校史教育既是校史建设的目的，同时也因其具有传播、传承校史的功能，而成为校史建设的一部分。校史教育的内容包括对新生及新入职教师开展校史教育讲座、开设校史课、向师生发放校史读物等。

2. 校史建设的意义

首先，开展校史建设是传承大学文化的必要途径。一所学校特有的大学文化的形成、发展与传承，是这所大学发展的核心动力。而大学文化的形成需要经历一定的历史过程。

其次，开展校史建设有利学校未来发展。知往能鉴今，这是历史最重要的“实用功能”之一。校史对于一所学校的发展同样具有这样的作用。

第三，开展校史建设可有效增强师生凝聚力。让每一名师生认知“自己”的过去，对于增强师生对学校的认同和归属感，增强师生的凝聚力。

第四，开展校史建设有助于学术史建设。教育教学和科学研究是现代大学最主要的两个功能。就目前我国和世界的总体情况看，大学已经是科学研究最重要也是最主要的机构，学术史建设是开展科学研究的基础工作。通过校史建设，尤其是校史的挖掘与整理，“可以从对学者个体的研究跳到知识群体的研究。学者的师承、流派，学者间的往来、交流，学术制度的形成、沿革，学术理念的塑造、坚守，政治社会环境对大学的影响、教育思想的嬗替，在校史中皆可窥见。一部校史，实际上就是近代学术史发展的缩影、个案。”

第五，开展校史建设有利于师生成长。校史是一所学校宝贵的教育资源：学校历史上的学术名师、教学典范、杰出的学校领导、优秀学生……他们的成就与事迹对在校的师生具有明显的激励作用；同时，校史（尤其是历史较长的公立大学的校史）作为时代发展的缩影，还凝聚着丰富的爱国主义内涵，体现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对师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素材。

（三）校史建设与大学精神凝炼

1. 校史与大学精神

校史是大学精神的母体。从历史学意义上讲，校史可分为两种：一种为客观的、真实的、完整的校史，这种校史因其复杂性和不可体验性，使得任何一位历史学家都无法根据现有资料将其复原；另一种是文本意义上的校史，可通过挖掘、整理、研究等手段，无限地接近真正的“校史”。在进行校史建设时，应尽量将典型事迹、人物，以及能够准确反映时代背景、学校精神面貌的事迹、人物“收录在册”——无论是成功的还是失败的，无论是成绩还是缺点，并将之告诉今人。

校史是客观的，大学精神同样也是客观的。因此，在进行校史建设尤其是进行校史挖掘与整理时，不可只讲成就而回避学校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唯如此才能准确表现大学精神。大学精神是校史的核心与精髓。因此，一所大学的发展历程在本质上可以说是这所大学的精神

的发展，校史也必然是一部“大学精神发展史”。

2. 校史建设与大学精神凝炼

首先，要做好校史建设工作，提高对校史建设工作的认识。在经过“文革”浩劫后，中国高等教育尤其是近二十年来又经历了合校、扩招等浪潮，目前仍处于“深度整合”期，主要着眼于教学、科研等中心工作，对校史建设重视程度普遍不够。但是有一些大学如上海交通大学已经设有专门的校史研究室，对校史进行挖掘整理与传播，并将其纳入教育史、学术史范畴进行深入的研究，总结发展规律。创新校史建设形式，增强校史的吸引力。目前，校史的主要形式是“正史”。这种校史因其“官方”性而对多数师生缺少吸引力：一方面缺少直观的感觉；另一方面常给人一种冷冰冰的感觉，缺少引起师生情感共鸣的内容。因此，创新校史建设形式、加强口述史和其他形式校史的建设，是做好校史建设工作的重要内容。

其次，在校史建设过程中注意总结凝炼大学精神。中国现代高等教育发展至今已有百余年历史，即使是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建立的大学，发展至今也有60余年的历史。对大学精神进行凝炼，形成并调适校训、校风、学风等大学精神要素，已是当前中国大学进一步发展的当务之急。而校史几乎是凝炼大学精神的唯一途径。因此，在校史的挖掘整理及研究过程中注意总结学校发展规律，发现学校在历次重大转折过程中所秉持不变的精神实质，以及在学校历史上杰出学者、教师、管理者以及校友身上所体现的共同的品质；在校史教育过程中，要注意发现师生对学校发展过程中表现出来的各种精神品质的态度，总结师生认可度高的精神品质；最后，要通过调研、发动师生及校友积极参与讨论等形式，总结凝炼出大学精神，并对校训、发展理念等做出调适。

第三，在校史建设过程中发挥大学精神的核心作用。大学精神是大学的核心生命力，也必然是校史建设的核心。因此，在校史建设过程中凝炼大学精神、把握大学精神，必然会使校史建设工作事半功倍。因对学校发展具有重大意义，大学精神的凝炼也必然是学校历史上的一件大事，需要慎重对待。做好校史建设这一基础性工作，并在校史建设过程中凝炼大学精神、发挥大学精神重要作用，是促进学校发展的一项重要工作。

（摘自：《校史建设与大学精神凝炼》东北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2期）

大学校史与现代大学精神

大学精神研究是个历久弥新的话题，与其说是“弥新”，倒不如说是国人对大学教育的重视。大学修史是历史进步的表现，是文明的表征。中国现代教育的“百年”发展史也是我国大学教育从“近代化”走向“现代化”的主要转折时期。一度许多百年老校都在编制校史，举行百年校庆。有些不足百年的高校也在筹办自己的校庆，其目的是重现大学的历史传统，再现各自的大学精神。1923年代理北大校长的蒋梦麟首次发表《北大之精神》演讲，他把“大度包容”和“思想自由”明确为北京大学的大学精神。透过校史，我们会发现大学精神、大学制度、教育家和大师的诞生，是一个共生的过程。

（一）为什么要修大学校史

校史，顾名思义指的是学校演变发展的历史，大学修史当然指的是大学校史的科学撰写与编辑。这里所讲的“修史”包含了校史撰写的原则及方法论思想。从某种意义上讲，校史研究介于文化史、教育史、社会史的边界。这就是校史研究为什么会成为时下很多非教育学者热衷的话题。北京大学的知名文学史家陈平原就是例证，他也一度被称为“校史研究专家”。大学制度的建立包括制度背后的文化思想、学术文化及与地方政府乃至国家的关系都是校史撰写应该关注的问题，大学的变革与改造背后必然含有制度的变迁因素。20世纪90年代初我国有学术传统重建的命题，后来大学史研究一度热捧。近现代大学的兴起和演变过程是文化移植、传承及制度变革、社会变化的过程，大学精神由此而生，大学理想由此而成。

北大90年校庆时,《精神的魅力》一书风靡大江南北。1998年北京大学进行了百年校庆,因为北大在中国高等教育史上的地位与影响,北大的百年校庆格外受人关注,这期间北大陈平原教授出版了《老北大的故事》,江苏文艺出版社随后出了《老武大的故事》、《老中大的故事》等等。关于老清华及西南联大的书也不断出版。陈平原主编的《老北大的故事》一度非常畅销,这在某种程度上让人看到了校史的社会价值。其实这些著作还算不上校史。时下一些大学为了修史,采取了很多办法,最常见的做法是突击出书,将各种学校年报、年鉴、文件汇编搅合在一起,然后再在学校的历史上按时间段进行个随意的划分,如解放前、解放后、文革时期、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等。有些学校因追求所谓的“大学辉煌”,还肆意修改大学办学的起始时间,不尊重历史。一些大学将历史起点甚至追溯到了宋代书院、近代学堂创建时期,这样大学的历史就更长了。一些大学因为战争等原因经历过搬迁、合并、回迁,大学校史的确出现两个甚至多个地方办学的历史事实,也出现过多所大学在某一特殊历史时期实为一所大学的情况。这样的校史如何修,有否可以遵循的修史原则,这都是校史研究应该讨论的问题。

另校史可否有所谓的“正史”与“野史”之分?如果是因为一些大学校庆的需要而突击编辑校史更应该小心谨慎。校史撰写可以说为教育史研究提供了一个新的研究阵地。一些学者看到了这种学术研究的人文价值,一度出现了众多跨学科的专家学者研究校史的情况。一些出版社也窥探到了这种著作的社会效应,纷纷组织出版了诸如大学趣闻、高校典故的著作,如辽海出版社的《中国著名学府逸事文丛》、四川人民出版社的《中华学府随笔》等陆续面世。虽然这些书籍都是关于大学校史的,研究的出发点却并不在校史的“正本清源”,而是满足人们对大学的另类需求,如怀旧的渴望与阅读的兴趣。这些并非学术意义上的大学校史,虽然都是关乎高校逸闻掌故,但还是让人们看到了大学精神的星星火光。其实,“大学野史”往往更能见一校之精神,更能“复原”过去大学校园生活的方方面面,已经出版的《从清华学堂到清华大学,1911—1929》,《从清华学堂到清华大学,1928—1937》是作者苏云峰教授花了二十余年的心血结晶。该书最大的意义在于为研究20世纪中国大学教育近代化提供一个思考大学精神的窗口。当然,完整呈现大学文化及大学精神的大学校史在时下的研究中却并不多见。我们知道一所大学若能为社会所认同,势必有一位令人称道的大学校长,势必存在一盏守望大学精神的灯塔。举例来说,研究浙江大学校史,你会发现“求实”已经成为浙江大学永久的“灯塔”。20世纪40年代,竺可桢担任浙江大学校长,竺可桢倡导“求是”精神,广延名师,民主办学,把浙江大学办成一所人文荟萃、蜚声中外的著名高校。在这里,不同学术见解、不同学派的教授本着“求是”精神,在开放、民主、自由的办学理念下,共同为浙江大学的发展做出各自的贡献。如何将这些再现大学精神的珍贵史料及历史经验融进新的大学校史写作中,成为大学校史研究必须面对的问题。

可以说,大学校史承载着大学的办学理念与大学精神。人们欣喜地看到近些年来有不少学者从跨学科的方法介入到大学校史与大学精神的研究。如北京大学文学教授陈平原先生出版《中国大学百年》、《老北大的故事》,著名人文学者钱理群教授主编《走近北大》,清华大学中文系教授葛兆光主编《走近清华》,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陈思和主编《走近复旦》。这些关于过去大学的历史资料,通过喜闻乐见的方式编辑出版呈现在读者面前,让我们更好地走近过去的“大学”,了解到什么是真正的“大学精神”。由此,可以看出近现代中国大学精神的研究已经呼之欲出。上述研究一改过去那种经院式的教育史研究风格,通过考据出故事,通过故事见精神,将过去诸多著名大学的若干问题一一道出,不乏研究者的“人间情怀”。从过去已经出版的大学史或大学教育史成果相比,校史研究时下还始终处于零星状态,更多出于不同研究者的学术嗜好。即便已经出版的高等教育史或大学史著作,如熊明安教授主编的《中国高等教育史》、高奇教授主编的《中国高等教育思想史》以及曲士培教授主编的《中国大学教育发展史》、霍益萍教授主编的《近代中国的高等教育》(华东师范大学出

版社1999年版），金以林教授撰写的《近代中国大学研究》（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郑登云、余立二位教授主编的《中国高等教育史》（上、下册）（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等都不足以满足时下对大学问题研究的需要。

大学校史写作时下存在两种范式，一种是意识形态导向下的大学校史写作范式，一种是人文情怀导向的“大学故事写作”。前一种我们要批判，后一种我们要重新审视。大学校史最不应该写成政治史，大学有大学之道。正因为这样，我们就需要科学的“修史”。史志兼修应当成为当下大学校史写作的倡导原则。今天我们去研究民国时期的大学，你会发现大学的韵味，你研究当下的大学，你会寻思大学的不足，为什么会这样呢？这就是反省的意义。反省民国时期的中国大学，研究北大、清华等大学的发展演变，你看到的将不只是校史。当然关于大学校史的研究不能仅仅看作是学者的个人喜好问题，校史研究也不能只见故事或轶事，必须是有“精神”支撑的“轶事”，方才值得史家认真对待。校史研究更多地应该被看成是大学教育如何回归“大学精神”的学术问题。过去已有的各种关于大学的研究在某种程度上极大丰富了人们对大学的了解和认识，但还远远不够。我们要认识到大学校史研究其实并非资料的堆积，大学精神的捍卫是过去中国近现代大学校史研究中不可回避的问题。大学需要“反省”，大学校史研究也需要反省研究，一个善于“反省”的研究与善于“反省”的大学同样重要。

（二）从校史看大学精神

大学校史的研究如何体现“中国大学精神”是一个相对独立的研究领域，它不仅是从“长时段”探讨中国近现代大学发展规律性的课题，而且也是认识当代中国教育变革尤其是大学变革、发展的重大课题。如何通过对近代化进程中的大学变迁的历史过程及其历史特征的揭示，来探明制约中国大学精神形成的社会因素和概括出大学走向“一流”所应坚持大学之道，这是大学校史研究中的最原始意义。

20世纪初以废科举、立新学为标志，中国教育史上开始出现一批“西学为用，中学为体”的新式学堂。于是一批名校在历史的风雨沧桑中变革着、发展着。研究清华、北大等大学的校史，我们发现这些大学只用大约十年左右的时间，就已经成为那个时代中国的名校。从历史的角度去看这些学校，它们在开创新学制，传播新思想、新的教育内容，探索新的教育、教学方法等方面开创先河，特别在教师录用方面充分体现唯才是用的教师招聘标准，在学校管理上充分发挥教授治校的管理效应。校长们鲜明的办学思想凝聚成各自大学的优良教风、学风，形成极富特色又具个性文化特点的办学传统，最终形成学校的一种校园文化，这种文化与学校的教学相得益彰，因此培养了一大批著名的科学家、思想家、文学家。特别是民国时期，一批高校如北大、清华等成为近现代中国大学教育的风向标。

翻开中国教育史，大学教育是最令人玩味的。20世纪初，在整整一个世纪的发展进程中，大学的发展及变迁始终是中国教育变迁的主体内容。即使对于整个近现代高等教育史而言，我们所说的高等教育的“近代化”，在本质上就是大学变迁的过程。回溯历史，我们发现中国现代意义上的大学的出现，集中在20世纪20年代。对这个教育现象，我们理应做出思考。特别对研究校史同仁来说，为什么中国现代大学从建立到初具规模、表现出很强的后来居上的特点？中国早期现代大学成功的经验，值得借鉴。

20世纪上半叶，我国战乱频仍、经济停滞、民生凋敝。令人瞩目的是，中国教育事业的发展却并未停滞。据资料统计，抗日战争期间，高等学校达到205所，在校生达12万。高等教育的发展速度比西方相应时期并不落后；在质量方面，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斯坦伯格根据解放前中国留学生（如杨振宁、李政道、吴健雄等）的表现，曾说：“中国的教育是世界水准的。”就总体而言，显然过誉，但还是涌现过以清华、北大、南开、浙大等为代表的知名大学。蔡元培认为，“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者也”。大学之所以为大学不是因为其规模大小或因为其人才的人数多少，大学的主旨在于学问的造诣及大学的品质。研究北大校史，

你会发现北大之所以“盛名”，在于蔡元培做校长时将大学改造成为真正的研究学问、培养人才的高等学府而非官僚习气十足、学术低劣的训练场。清华大学在梅贻琦担任校长后，积极倡导通才教育、坚持教授治校、主张学术自由，将清华大学由毫无学术影响力的留美预备学校，改造成“蒸蒸日上、跻身于名牌之列的大学”。通过北大的校史来看，20世纪初，北大校长蔡元培所提倡的“兼容并包，学术自由”、“教授治校”的思想及其北大的管理实践，可以说开创中国现代大学之先河。它标志着中国近代大学精神从一开始就占据一个非常高的制高点，其影响意义是深远的。即便到抗战时期的西南联大，也保持当时国内绝对领先地位的学术水平和教育水平，尽管当时中国一直处于战争状态，但中国的许多大学并没有因为战争动荡而迷失自己的发展方向。相反，各大学在诸多名校长的引领下，在诸多秉持学术自由大师的坚持下，大学依然坚持不懈地捍卫各自的办学理念，凸显那个困难历史时期特有的大学品质。

虽然如今各类大学校史都在注意收集年鉴、校徽、校歌、历史沿革以及教职员工名录等校史文献，甚至都在编辑各自的学校发展史，这些都体现了时下一些教育管理者及研究者对大学教育传统及文化传统的重视度，但是各式各样的编年史写作思路并没有让人们看到大学的灵魂，更谈不上大学精神。大家看到的多是冗长的资料汇集。大家见到的校方修史又多是自说自话，狭窄的研究体例，枯燥的写作方法，见事不见人或见人不见事的资料堆砌让读者看不到校史的学术价值。在校史研究过程中，大家很难看到大学精神的提炼。大学校史倘若没有呈现各自大学多少年来发展及传承下来的大学文化及大学精神，包括大家所熟知的科学与人文性、课程的通才教育观、传统与现代的对接、发散性知识与批判性思维的培养，这样的校史研究就毫无意义。大学校史的确是研究与透视大学何谓、大学何为的阵地。到目前为止，我们还没有看到较为理想的能够体现各自大学精神及大学品质的校史研究成果。从“校史”的角度去研究大学精神的著作更难读到。而陈平原等人的校史研究成果毕竟又都是针对北大而言的，它提供给读者的只是北大的大学之道。

北京大学中文系的陈平原教授最早在北京大学学报曾发表过自己的观点。他认为将北京大学按照“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的准备和进行期”、“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在抗日战争时期和全国性内战前夕”、“在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来安排校史的写作是不科学的，每章按照先交待政治事件，后写教学与科研的写作思路更是不可取的。1991年，为纪念清华大学建校八十周年，清华大学校史编辑委员会、校史研究室开始选辑出版《清华大学史料选编》（1911—1948年），至1994年4月共出版四卷六册，即汇编清华大学建校至解放前历史时期的有关校史资料。这段时间的史料，按清华大学经历的四个时期各辑一卷，其中：清华学校时期（1911—1928年）一卷一册，国立清华大学时期（1928—1937年）一卷两册，抗日战争时期的清华大学（1937—1946年）一卷两册，解放战争时期的清华大学（1946—1948年）一卷一册，《清华大学史料选编》受到广大校友和关心清华的各界人士的关注和赞许，认为“该书为了解清华、研究清华，提供了切实可信的史料”。

（三）藉大学校史，重温大学精神

在中国大学教育史上，像北大、清华、浙大、南开许多著名大学历经沧桑，系科屡经分合，校址也数次搬迁。但是众多名校诚朴坚毅、自强不息的优良传统和严谨求实、拼搏创新的校风、学风在一代又一代莘莘学子身上薪火相传。正是这种优良的人文教育传统和校风、学风使得我国许多著名的高校得以扎根于中国和世界文明的沃土。如研究南开大学校史，我们发现南开的历史线路是张伯苓校长创校、日军炸校、南开抗日战争期间南迁组成西南联大、南开由私立转变为公立。如此之曲折的大学校史在中国并不少见，但是著名大学不是创建开始就成为名校的。北京大学、南开、复旦等大学算得上是中国的著名大学。但是在它们成为名校之前，这些大学是如何发展起来的呢？这是大学史研究留给我们的思考。其实究其实质就是一种“大学之道”或曰“大学精神”。清华大学老校长梅贻琦曾说过：“所谓大学者，

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可谓一语中的。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提出“允公允能，日新月异”，可谓南开精神的历史写照。或许藉大学校史的研究，我们可以从中更深刻地了解徜徉在北大、清华、浙大、南开等名校的“大学之道”。

研究中国大学校史，看看大学精神是如何坚守的，可为我们今天大学的发展和建设提供极重要的正反两面例证。而大学建设之重要，在于它是民族的思想灵魂。现在许多大学，特别是著名大学都在争创世界一流高校。中国的著名高校离世界一流究竟有多少距离？由此看来研究我国著名大学校史，包括修史，着力研究大学精神对现在我国的高等教育改革固然有着十分重要的理论与现实价值。这也是大学校史研究工作中需要解决的问题。官方认定的第一所现代大学是1895年建立的“北洋大学”，而1998年成立的京师大学堂，起初追随东京大学模式。中国的大学走的是先学日本后学美国和欧洲的发展路径，致力于大学自治权和高度的学术自由精神在中国近现代大学发展路途中从来就存在。在近现代中国大学发展的“征程”中，著名大学校长的作用是不可低估的。中国现代大学能够成功转型，尤其在大学精神的捍卫上得益于大学制度的设计者，他们大多是有世界眼光的人，像蔡元培等，另外这些校长也多是受过西方教育的大学者。

在现代大学的萌芽时期，我们不可忽视那些名校校长对大学发展的影响。他们的大学理念是大学发展从“近代化”走向“现代化”的关键。大学自治、学术自由、教授治校在大学里是否相对充分地实现是衡量大学发展的基本尺度。这也是人类大学发展史留给我们的最珍贵财富。

自清末至今，中国近代高等教育已走过了百年的历程。在这百年时间里，中国高等教育的近代化呈现出独特的发展轨迹。中国大学的近现代对接的交接点不是遵循西方大学的“文艺复兴”式，在近代与现代之间，中国大学的发展寻求的是西方大学的理念。北大、清华更是中国大学的双子星座，蔡元培、梅贻琦成为缔造中国现代大学精神的旗手。我国近现代大学是在经历战争与动荡过程中发展起来的，如大学的西迁和南迁，西南联大的出现就是中国近现代大学缔造辉煌的历史明证。19世纪中后期的洋务运动，洋务运动客观上推动了我国近现代大学教育在知识内容与西方先进的课程思想对接。19世纪90年代近代分科大学产生，盛宣怀于1895年创办天津中西学堂，随后又在上海创立南洋公学，这些可以说是中国高等教育近代化的开始。教育近代化的知识表征是学科内容的西方影响，表现在对传统教育进行适度改造与更新。如将大中小学堂章程、课表通颁各省，全国统一学制，这将中国教育完全推上了近代化发展的历史轨道。“废科举、改书院、兴学堂、建学部”等一系列具体的教育改革与其说是制度演变、学校改革不如说是为中国大学发展的近代化打下了坚实的发展基础。中国近代大学在源流上看，确实是从西方移植过来的。即是说中国近代大学在20世纪较好地移植了西方的教育制度，却谈不上很好地继承了中国古代的“大学之道”。

在研究内容上，可以突出各自学校的教育人文传统、校长的办学理念及课程实施的课程观的介绍，别小看这些经验，这是大学屹立于世界教育之林的根本。中国现代大学教育虽然起步较晚，但中国现代大学教育的起点并不低，如1928年正式成立的清华大学，只用了10年时间就发展成为那个时期我国的知名大学。中国的很多大学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年以前就是极具文化个性以及学术影响极大的“著名”高校，如大家所熟知的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等。“兼容并包”是北大的标识，“自强不息，厚德载物”是清华的精神，“允公允能”是南开的写照。鉴于此，历史曾经成就了一批中国名校，这些名校也因此曾创造了中国大学教育的辉煌。解放后，受政治因素的影响，我国的高等教育发展走了很长一段弯路。大学的生态遭到了严重破坏，一度我国大学的人文精神丧失殆尽，一度大学异化为生产成品的批发加工厂。当下现代高等教育的许多问题就是明证。

（摘自：《大学校史与现代大学精神》河北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14年9月第5期）